

悼王尧先生

上海远东出版社 徐忠良

十二月十七日，本是个平常不过的日子，再有一周，就是平安夜了。听多位朋友说，王尧老师因吃饭呛着进医院救护了，不过已经无恙，便想着这几天去北京出差时再去看看老师。

孰料下午五点开始，就感到莫名的不安，头晕胸闷，坐立难平，心口堵得厉害。晚上七点半，收到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冯良发来的信息：“今晚六点，王尧先生去世了，很平稳。”

这十四个字瞬间击中了我，眼泪夺眶而出，不敢相信！

老师在复旦大学的弟子任小波博士随即告诉我进一步的情况，在浙江大学的弟子谢继胜教授也旋即与我确认老师西去。与此同时，微信圈里已遍传王尧先生逝世的消息。

痛彻心扉！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暴雪那天，才和几位同事一起去海淀四季青养老院探望过，那时他一切都很好呀！

王老师看到我来很高兴，一直拉着我的手，听我报告几个月来的工作，不住颌首、指点、微笑，说他在这里一切很好，让我放心。我们前前后后整整说了二个多小时的话，我送上了几本关于《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造的图书，也报告了即将要推进与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皇清职贡图》的合作，由于职贡图涉及乾隆时期二百七十多个民族，要请他做学术顾问，帮助把关，并参加原件再造展览开幕仪式和学术研讨活动，他欣然应允，还为我逐一指点门径。

那天，老师还很健朗，虽然坐在轮椅上，语速有点慢，但吐词清楚，思路清晰，怎么，才短短不到一个月，他就魂飞太虚了！

泪眼婆娑中，我脑海中闪出一幕幕跟随老师学习的情景以及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历。

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我跟随王老师学习藏语文和藏族历史文化。由于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和汉藏关系研究》，之后又写了《金城公主入蕃和亲几个年份考辨》的文章，并参与敦煌佛经注音的研究，加入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我认真阅读、参考了王尧老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等著作，产生了向他学习西藏文的想法，在获得当时的工作单位杭州大学的同意后，我给王尧老师写了一封信，申请能成为他的进修生，学习藏语文和敦煌古藏文。不料很快接到了王老师同意接收我为进修生的亲笔信，要我九月开学后去报到。

学完一个学期的现代藏语文和藏族历史文化课后，次年开春又和荣新江、钱文忠、王家鹏、吕铁钢和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等组成七八人小班，听王尧老师讲敦煌古藏文研究，讲他的吐蕃三书：

《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正是这次的进修学习，引领我从此踏入了藏学研究大门。

返回杭州大学后，由于申请援藏未果，我转而关注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的元代藏传佛教造像和凤凰山、西冷印社等地的其他环西湖藏传佛教遗迹，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来这个项目的研究由王门弟子谢继胜教授组成一个项目组完成，这部《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研究》业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初我离开杭州大学转入了浙江出版界工作。一九九七年有幸得到王尧、陈庆英先生主编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书稿，获得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于友先、杨牧之和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支持，确定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因而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长旺久、责任编辑冯良、美术设计翟跃飞结下深厚友谊。《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出版后，在拉萨举行了十分隆重的首发仪式，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旦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肖怀远和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同时出席，一个省份负责文化工作的三位最高领导同时出席一部书的首发仪式，这在后来的图书首发式中再也未曾得见。图书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引发了全国出版援藏的热潮。

因在杭州工作，后受王老师所托与他在浙江桐庐的堂哥王作保持密切联系，方知王老师竟然和堂哥同是新四军金萧支队的战士，曾在浙江萧山、安吉、桐庐等地英勇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因此王老师每次到南方，都会尽量到杭州，找机会看望兄长王作。最近的一次是二〇一四年七月，王老师只身南下，将他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捐赠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之后，我陪同他前往浙江安吉，参观吴昌硕故居，探访这位“一月安东令”（王老师故乡江苏涟水旧称安东，吴昌硕曾任安东县令）旧迹，笑称要拜拜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家乡父母官。随后，又陪他前往浙江桐庐第一人民医院，拜见带领他投身革命的长兄王作。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说话的大哥早就盼着兄弟，坐在轮椅上的王老师甩开轮椅，颤巍巍地走上去，一把攥住了大哥的双手，互相摩挲着，两人默默流泪，深情凝望，令我们在场的人都心伤不已。这是两位新四军老战士亲兄弟的最后一面，一个星期之后，离休干部、新四军老战士王作大哥安然去世。其后王老师与他家老二王敞几次和我说起谢谢我，让他见了大哥最后一面。

二〇〇六年，杭州两所毗连一起的中专学院的汉藏学生发生冲突，王老师到杭州出差，曾特意前往看望藏族学生，和他们拉家常，告诉他们汉藏是一家；也和浙江省公安厅和教育厅的领导沟通，希望给藏族学生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努力化解汉藏学生之间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矛盾。

二〇一〇年我已调到上海的中西书局工作，王老师来沪参加学术活动，特意带我参加一个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的西藏新闻工作者的聚会。听到他慈祥的藏语问候，在场的十几位簇拥着他的西藏媒体藏族记者全部涌出了眼泪，安静地听他讲述西藏历史文化和内地的关系，强调汉藏是一家，等等。聚会结束后，王老师谆谆嘱咐，要我常去看望这些西藏新闻工作者，说他们长时间离开西藏在上海学习，你如能用藏语和他们交流，他们会很温暖的。这些话我一直记着，只可

惜我的藏语长期不用，只能简单说几句了。幸而如今王老师的嫡传弟子任小波就在复旦大学工作，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和西藏朋友们时常相聚了。

在王尧老师门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进修生，充其量是编外门徒，却在王老师及王门弟子群中受到厚待。二〇一〇年，中西书局和著名佛教学者李家振先生与西藏萨迦寺民管委主任萨迦·班典顿玉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西藏萨迦寺佛教艺术》丛书，内含《萨迦普巴金刚》、《吉祥萨迦》、《萨迦大黑天》三册。图书出版后，好评不断，但专家和读者都有一种想更详细地了解萨迦寺的愿望，因此我专门登门求教王老师，是否可以和西藏文物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及王门弟子合作，组织出版一套扎实的萨迦寺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萨迦寺是元代萨迦派主寺，是西藏归顺中央政府的象征，如能将萨迦寺所藏的相关汉藏文文献、文物，尤其是举世闻名的萨迦寺经墙经卷整理出来，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和出版项目，而且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个设想获得了王尧老师的肯定和赞扬，并立即多方联系落实。不久，我们就作出了由中西书局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这套大型丛书的计划，王尧老师和马丽华先生等组织召开了几乎全部王门弟子参加的项目论证会。可惜因为牵涉面过大及经费尚未落实等原因，没有能够真正启动。

二〇一三年初我调上海远东出版社工作，碰巧和浙江安吉县人民政府合作，组织撰写出版了《幸福不丹·幸福安吉》一书，并邀请不丹前首相肯赞多吉来安吉、北京出席了相关活动。王老师得知后，特别高兴，说我做了一件国家想做没有做成的事，让我尽快和外交部亚洲司负责印度、不丹事务的李亚处长取得联系。不丹是明代中叶从西藏地方附属小邦独立出去的，虽然其经济和外交受到印度的控制，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但不丹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仍然是藏语、藏文，城镇乡村满眼的藏式建筑，藏族文化弥漫全国。但由于历史原因，又受到印度的干扰，不丹是惟一直没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王老师对我们能以幸福指数话题为切入点访问不丹，面见不丹王国政府前首相利翁波·肯赞·多吉、国家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和国家幸福委员会秘书长卡玛·塔斯蒂姆先生等政府高官，就幸福指数和幸福话题展开学术交流感到十分欣慰。不久李亚处长召集我们访问不丹的成员专程去外交部亚洲司，听取我们和不丹政要的沟通情况，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鼓励我们继续用学术文化的通道和不丹保持联系，希望在合适的时候再次邀请他们访华，并鼓励浙江省安吉县政府和不丹地方建立友好关系。我们正在积极沟通，努力促成由王门弟子组成学术团队承担不丹国家图书馆馆藏藏文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任务；也积极筹备将《幸福不丹·幸福安吉》译成英文公开出版。

二〇一一年好友寒碧先生创办的《诗书画》杂志计划刊登王尧先生的文章，我陪同寒碧先生带着《诗书画》的第一、二、三期杂志去见他，老师立即被《诗书画》杂志的内涵和品格所吸引，认为当下太缺少这样高品味、富有心灵的杂志，太缺少像寒碧先生这样一心只想提高杂志品质的杂志主编，允诺一定要给予支持。王老师不仅同意自己的文章在杂志上刊登，主动分送中央文史馆的同事和学界大佬，呼吁他们支持，还动员他的朋友、学生把好稿子投给《诗书画》杂志。当

天我们就商定在第七期开出了“重温 王尧”专栏，刊登他的二篇文章《藏族四大诗人合论》和《诗人、圣者米拉日巴的自然雅趣与性瑜伽观》，并请沈卫荣撰写了主持人语，文章刊登后，获得各界广泛关注和赞扬。

回望王老师的一生，待人宽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学养深厚，著作等身，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藏学家、敦煌学家和佛学家。然而他不单单只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胸怀博大、视野宏阔，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学家，中国现代藏学之父、《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译者于道泉教授的衣钵传承人，其弟子任小波已经在《人民日报》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十四版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他的学术成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王尧藏学论集》，中国藏学网发布王尧教授论著目录。沈卫荣先生在《诗书画》杂志“重温 王尧”主持人语中，也做过颇为传神的介绍：“王尧先生是中外知名藏学家中少有的文史兼通，对出世的宗教和入世的社会、历史和政治都有精深研究的藏学大家。他早年专治藏族文学，曾以翻译《萨迦格言》等藏文文学作品、研究藏族吸取而蜚声学界；中年则专治藏文历史文献，他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等，通过对这批最古老的藏文历史文书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为图博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了晚年，王先生从心所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文章，擅用文学的笔法，将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藏族历史的错综复杂、藏文文学作品的优美奇特，形象生动地传递给读者。”

而我，细思与王老师近三十年接触的点点滴滴，总结所感所受，认为他就是一位由藏语文进入藏族文学、藏族历史、藏传佛教，有学术而心灵，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甚深情怀的老战士、大学者、大菩萨。这样的学术宗师怕是越来越少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藏语翻译，王尧老师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迎接藏历木羊新年的盛典；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代表团的相关接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藏文版的翻译；改革开放之初，全程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考察西藏，走遍前后藏区。并同时开启了和国外藏学界的广泛交流，连续参加第三至第十届国际藏学大会，主编十七辑《国外藏学研究译丛》，他风趣地说，“做点小贩而已，贩些洋货回来，贩些土产出去”。同时又将藏在法国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引回国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了晚年，他将自己的藏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西藏民族学院；他培养的门徒遍布世界各地，在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都活跃着王门弟子的身影。因此，谈起中国藏学，怎么也绕不开王尧老师，他对于中国藏学的兴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我曾多次和王老师说起，要着手安排请他详尽口述他参与西藏和平解放，和十世班禅大师、赵朴初会长、东嘎·洛桑赤列活佛、贡嘎上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佛学大德与西藏上层贵族交往

的历史；他陪同胡耀邦总书记长达一个月的西藏考察经历；他和国际藏学界德国、匈牙利、法国、美国藏学家的学术交往。他也觉得很好，愿意做这样的口述，将他亲身经历的这些历史留下来，供后人研究。可惜这个设想都来不及实现了。记得季羨林先生说过，敦煌学是二十世纪的显学，藏学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显学，我们欣喜地看到，季老的预言正在步步实现，然而，王老师却溘然远去……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写到这里，短信收到王老师的老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发来的悼诗：“悼王尧先生 昨晚近十时，国图萨仁高娃研究员发来噩耗：王尧先生于六时许仙逝。闻讯不胜悲痛，彻夜难眠，吟此小诗悼念。尧老一生最赤诚，心系吐蕃中华魂。踏遍青藏三江路，练就般若四谛身。坦坦荡荡谈大局，孜孜矻矻撰弘文。一夕羽化登仙去，化作人间杜宇声。”又读到好友寒碧先生在微信群中发布的悼文：“王尧先生藏学大宗，文事史裁，修养诣极。所译萨迦格言，承学推为精卓；条贯吐蕃简牍，论者叹谓采山；《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诸作，皆征实醇备，无高言溢滥。我初创《诗书画》，曾求助于先生，仰其扶掖，倾力奔走，屡荐作者，逢人说项。先生离世，忆此增恸。雪涕转此，以为纪念。”

文毕掩卷，不觉大恸。王尧老师，您一路走好！愿您早日乘愿再来！编外门徒徐忠良叩泣！